

起的时候,便不会有任何可被施以宽容之物存在了。”<sup>①</sup>在将怀特的理论取向或明或暗地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时,金兹堡也许过于深文周纳。但是,他所提出的疑问——丧失了“求真”的诉求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是否真的可以给自由和宽容带来它所许诺的广阔空间——却是后者所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中解决的问题。

##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董立河

关于后现代主义,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谓纷纭芜杂,莫衷一是,但最权威的论述仍然出自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该书中,利奥塔区分了两种知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所谓科学知识,大体上相当于实证科学知识,通常是由一系列定义性的或描述性的陈述所构成。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一些事实判断,它们有真假之分。所谓叙事知识,相当于讲故事,通常是由一套述行的和规定性的陈述所构成。叙事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些价值判断,它们没有真假之分。科学知识始终与叙事知识处于某种吊诡的关系中。一方面,科学知识总是质疑叙事知识在认知方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将后者视为“寓言、神话和传说,仅仅适合妇女儿童的口味。”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诉诸叙事知识来支撑自己话语的合法性。“科学知识无从知道自己是真知,也无法使别人知道其为真知,除非它诉诸另外一种知识亦即叙事知识,而从科学知识自身的观点来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sup>②</sup>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合法性要由一系列宏大叙事来加以保证。宏大叙事亦即大故事,指的是有关世界的总体理论或哲学。比如,世界万物的可知性、语言精确再现实在的可能性和绝对自由的可能性等。在利奥塔那里,最主要的两个现代宏大叙事是黑格尔的思辨叙事和马克思的解放叙事。前者讲述的是知识终将统一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人类终获解放的故事。但是,在利奥塔看来,从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完成战后重建开始,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而西方文化也进入所谓后现代时代。在后现代状况下,随着通讯技术、大众传媒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知识越来越转化为话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日益离不开语言符号。面对多元异质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人们开始怀疑宏大叙事的可信性。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sup>③</sup>元叙事亦即宏大叙事。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便是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崩塌或终结。具体到历史领域,宏大叙事指的是有关历史意义和史学知识的总体理论。现代历史学家通常都是或隐或显地诉诸历史进步性、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再现历史实在的可能性等元叙事来保证自己学科的合法性。20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历史学也步入后现代阶段。历史元叙事已成明日黄花。历史进步被视为意识形态和神话,历史事实也被等同于文学虚构和语言制品。在这些元叙事支持下的历史学也面临危机和困境。

<sup>①</sup> Carlo Ginzburg, "Just One Witness," pp. 93-94.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问题研究”(项目号:13BSS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完成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家兴先生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认真审读了全文,并就文中某些细节问题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sup>②</sup> J. 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27, 29.

<sup>③</sup> J. 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 xxiv.

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历史认识和历史语言的客观性等元叙事构成传统“历史理性”的核心内容。根据刘家和的观点,“历史理性”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sup>①</sup>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基本对等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它探究历史进程的规律、节奏和意义等问题,历史进步论题是其中的焦点问题。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大体相当于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本质,其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或合理性,其中也隐含着历史语言的透明性。在后现代语境下,作为传统历史学最终根据的“历史理性”遭到无情的奚落和攻击,从而导致历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在新的历史观念背景下重新讲述历史元叙事,重建历史理性信念,从而解决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呢?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论题。

## —

19世纪中期,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埋葬以后,便把牛顿的科学范式推上霸主地位,使之成为当时各种学科和话语的标准。实证主义纲领通常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确立事实,其次是探索规律。19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实证主义精神的浸染。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是把孔德的实证主义贯彻到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他们力图在考订、分析和综合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兰克对于历史规律不感兴趣,他宁愿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步。对他而言,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广泛搜集和审慎考订,“如实直书”,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历史学的任务是了解显示在原始资料中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和意图,进而把握其背后更为深远的精神和意义。因此,历史学方法论所需要的是一种强调对文本资料或精神表达进行理解的学问,这便是诠释学。<sup>②</sup>兰克派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他们表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形式则是叙事。19世纪末,为了抵制实证主义(准确说是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二步)对历史科学的僭越,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哲学家开始对德国历史主义诠释学传统进行辩护,试图为人文科学制订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明确方法论。他们强调,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个别阐释法和自然科学的一般概括法截然不同,前者力求理解事件的独特过程,而后者则力图通过普遍规律解释自然现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观念也大体上属于这种侧重“理解”和主张史学自律的历史思想路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狄尔泰仿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进行了“历史理性批判”,意在为历史学确立认识论基础。在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狄尔泰拓展了传统诠释学的视野,从原来对个别文本段落的理解上升为对整个文本的理解,并把“体验”视为诠释学的核心范畴。“体验”是一个事实、情感、意义和价值的经验统一体,它不能借助实证主义方法进行“解释”,而只能通过诠释学方法加以“理解”。

从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政治、社会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下层阶级和劳动人民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日益不满于19世纪那种仅仅关注伟大人物和具体事件的历史学,开始把历史眼光从政治转移到社会,从精英转向群众。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不得不让位于社会文化史。但与后来的“新新史学”有所不同,这种“新史学”的研究内容虽是普通大众的生活,但并不局限于个人的行动,而是

①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伊格尔:《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分析不为人知的社会进程。历史学家注重普遍而非特殊,强调深层结构和力量而非个别人物和事件。面对新的研究内容或主题,他们抛弃传统史学用以理解和描述独特历史事件的诠释学方法,而选择用以分析和概括历史进程的解释性方法。历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二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巴克尔和泰纳的研究路线。他们更紧密地把自然科学当作范本,广泛采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致力于解释历史行程和社会结构。<sup>①</sup>这样一来,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专业历史学所特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转化为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形式”。<sup>②</sup>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的辩护主要是由韦伯完成的。韦伯提倡一种旨在“理解”社会的“理解的社会学”。但是,与兰克的“移情”和狄尔泰的“体验”不同,韦伯所说的“理解”乃是一种高度合理性的过程,它并不排斥因果性的“解释”和分析。也就是说,尽管社会科学在性质上是历史的,但作为科学它还是要求严格的因果解释概念,这些概念考虑到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并提供了假设亦即“理想型”,以衡量事件的经验主义过程。另外,为缩小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距,新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和亨普尔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确提出一种基于普遍规律的历史解释模式,亦即覆盖率模式。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也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由于其从科学哲学出发的外在性而没有对史学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

以上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明显,它们共同分享着两个基本的哲学前提或元叙事:其一,从认知和语言层面上来说,肯定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实的人和事,历史学家的叙述必须与之相符合,也就是说真理符合论是可能的。大部分诠释学传统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坚信,通过对档案文本的语言分析可以重建历史主题的明确意义,重现“实际上所发生的”过去,并精确地将其叙述出来。在狄尔泰那里,诠释学是一种准认识论,它肯定传统认识论对真实过往的指涉性。作者(历史学家)和文本(证据)之间的诠释学循环是可以闭合的。实证主义或社会科学倾向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明晰的概念和理论相对真实地反映宏观历史和社会的结构和进程。对韦伯而言,虽然“理想型”具有相对于外在世界的自足性,但它假定了社会结构和历程的真实存在,如同康德的先验范畴假定了“物自体”的存在。方法论的逻辑范畴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我们可以通过将之与经验发现相对照来触及社会实在。总之,两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都相信,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或中介,他们终究可以发现过去的秘密,能够实现那个客观化的崇高梦想。

其二,从本体论上来说,传统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历史学家都不自觉地诉诸一种历史进步观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方向性。兰克的确已经摒弃认为历史是一部普遍史的历史哲学观念,然而他仍然相信历史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贯性与发展历程,而且还赋予西方历史以一种优越地位。社会科学派的史学家虽然抛弃孔多塞和黑格尔有关人类社会日臻完善的乐观信念,但仍然相信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是沿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运动,至少近代西方历史是一个不断“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发展进程。他们同样赋予近代西方历史一种优先地位。在他们那里,世界史就是一个西方化的历程。<sup>③</sup>

① 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倾向的史学家包括德国的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法国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以及美国的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詹姆斯·罗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新史学”流派的史学家。

②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3页。

③ 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22、41—46页。

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上述历史认识论、历史语言论和历史本体论的元叙事就受到过批判和质疑。尼采率先对历史知识客观性和历史语言透明性的元叙事进行了抨击。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启蒙乐观主义元叙事,则受到尼采、布克哈特、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想家的挑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历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历史元叙事受到彻底颠覆,历史理性遭到根本质疑。

##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历史逐渐丧失了唯我独尊的优先地位,而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汇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环境的威胁日趋明显。对大屠杀的反思动摇了人们对人性的乐观信念。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先仅仅徘徊在精英思想家中的那种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悲观主义成为了人们的普遍意识。如前所述,利奥塔旗帜鲜明地向有关进步的宏大叙事亦即詹金斯所谓的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大写的历史开战。另外,德里达、拉康、博德里亚和罗蒂等激进理论家也积极推动这类宏大叙事的崩溃。解构语言再现历史实在的可能性这类宏大叙事的任务则是由另外一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完成的。这些理论家主要包括巴尔特、福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比克霍福和拉卡普拉等人,其中海登·怀特最具影响力。他们通过消解语言透明性的元叙事从而颠覆了以具体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学院派小写的历史。<sup>①</sup>

在现代语境下,语言通常被视为一种借助概念反映实在的透明之镜或者传达意义的中性载体。人们相信,语言能够准确地将非语言实在中固有的意义和秩序描述出来。但是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指涉功能提出了质疑。根据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自主体系,它非但不是意义的有效载体,意义反倒是它的一种功能。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被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推向极端,并左右了他们对于文学和史学的看法。在他们看来,语言并非指涉而是构成了实在。语言是实在的最终视阈,不存在独立于人类语言和话语之外的超语言实在。语言自身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符号之间处于无限的相互指涉中,因而永远不会达到某种固定的意义。

1973 年,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sup>②</sup>一书,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策略分析历史文本,标志着历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的出现。所谓“元史学”,就是跳出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学的本质、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在随后的一系列论著中,海登·怀特进一步把后结构主义贯穿在对历史书写的研究中,阐发了一套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sup>③</sup>在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仅仅是一种连续的和无意义的流变,本身不具有任何固有的结构或情节,它们在历史著作中看起来所具有的故事形式是由历史学家通过语言和修辞策略发明和赋予的。“任何一组给定的真实事件都能够以很多方式被编织成情节,都能经得起以多种不同的

①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2.

②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③ 参见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故事类型来讲述。任何特定的一系列真实事件都不会原本就是悲剧的、喜剧的、闹剧的，等等，而只能通过事件之上施加一种特定故事结构的方式被构建成这样”。<sup>①</sup> 怀特所探讨的就是实在性历史作品在整体文本层面上的虚构性。在他看来，历史叙事实际上是“语言的虚构；其内容被发明的成分不亚于被发现的成分；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的形式相似，还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相似”。<sup>②</sup> 总之，历史作品是历史学家将一种叙事强加于过去的产物，因而是一种文学制品。历史知识不是根据经验主义的方式获得的，而是由历史学家的美学决定造成的。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也与海登·怀特持类似的观点。<sup>③</sup>

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结论是：语言是自我指涉的系统，它不是反映着实在而是创造着实在。它取消历史叙事和文学虚构之间的分野，否定重构真实过往的任何可能性，从而淘空了历史写作的客观实在性。正如詹金斯所说：“整个现代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一种自我指涉的、有问题的利益表达，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性的话语……实际上，历史学现在似乎不过是无根基的、定向性表达世界中的另一种无根基的、定向性的表达。”<sup>④</sup>

无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于史学实践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元叙事的崩塌导致史学实践的革新。1979年，劳伦斯·斯通撰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观察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了一场根本变化。社会科学史学家相信，能够对过去的变化做出连贯的科学解释。这样一种信仰如今已经被人们摈弃。群体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等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又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对具体个人经验的重新强调就导致了叙述型史学的复兴。<sup>⑤</sup> 对语言再现历史实在元叙事的质疑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它使人们充分注意到语言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作用，促使史学理论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研究历史话语和文本，详细考察历史书写的不同方面，并有助于历史学家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数。“源自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语言学转向’的观念反映在了今天许多历史写作中，尽管这些观念并非直接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而是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在史学思想和实践中的相关发展。”<sup>⑥</sup> 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和话语观也影响了西方很大一部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sup>⑦</sup> 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启发下，罗森斯通等历史学家突破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采用感知和再现世界的最新形式，在历史编纂领域做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开创了被称为“实验史学”的史学实践新形式。由罗森斯通与蒙斯洛于1997年合作创办的《重思历史》刊物是实验史学表达

①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44.

②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 82.

③ 参见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F.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④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p. 6.

⑤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85, 1979.

⑥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0.

⑦ 参见 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Knopf, 1988; Simon Schama, *Dead Certainties: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New York: Knopf, 1991.

其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阵地。<sup>①</sup>“语言学转向”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当今很多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并影响了他们对于未来史学前景的展望。<sup>②</sup>因此，笔者不赞成时下把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作为虚无主义一味加以抨击的简单做法。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因素和理论建构性，打破传统史学观念独霸史学界的一元格局，从而向人们打开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正是在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和启发下，西方史学家重思历史，大胆革新，迎来史学园地繁花盛开的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状况下，每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正视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只有在回应或批判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的创获。

### 三

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语言唯心论”或“文本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其极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倾向，其“什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都难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可靠指南。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推动宏大叙事的崩溃，从根本上削弱了历史学赖以存在的前提假设，从而使之处于无所依托的非合法性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对之进行辩证的批判或“扬弃”，以便重建历史学的合法性根基。在利奥塔看来，在元叙事全面崩塌的状况下，科学合法性的保证实际上是“操作效果”，这是一种强调最佳输入/输出率的“技术标准”。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作为核心生产力和主要经济因素的知识逐渐被商品化。生产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和买卖，消费知识是为了进行新的生产。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知识的真实性，而是其有用性。教育不再被视为一种对心灵的教养，而纯然是提高职业技能的手段。利奥塔并不认同这种急功近利的合法性标准，但也不主张回到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标准上去。他提倡一种奠基于“逻辑倒错”（paralogy）的知识合法化形式。从词源学上说，paralogy 这个词由希腊词根 para（在……之外，超越……）和 logos（逻各斯，亦即理性）构成。因此，paralogy 指的是一种超越理性或反理性的趋势。在他那里，paralogy 意味着对传统固定思维方式的反动。就科学研究而言，这就是通过打破固有的学术规范，通过改变语言游戏规则或创设新的语言游戏等方式，以达到不断“创生观念”的目的。<sup>③</sup>在这一点上，利奥塔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追求新颖反对总体性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

与利奥塔一样，我们也反对“操作效果”标准。如果以此作为历史学合法性的标准，历史学必将执着于“用”，而舍弃“真”、“善”、“美”等高蹈的价值诉求，并因此而极易流于低俗的实用主义。但我们不赞同利奥塔所谓“逻辑倒错”（paralogy）合法性标准。它所导致的多元性、异质性和碎片性的结果会使历史学陷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潭。我们主张在新的历史状况下重新讲述宏大叙事，也就是说，通过融合现代和后现代视界实现宏大叙事的否定之否定。

尽管宏大叙事具有建构性和先验性，但它们却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不可剔除的“前见”或理论前提。奥拉巴里认为，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新形势下，“如果没有一种对过去的全球式解释，用以理解现在和指引未来的道路，世界人民就无法生存”。<sup>④</sup>这当然有些言过其

① 参见董立河：《罗森斯通的实验史学：实践与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

② 关于后现代主义导致西方史学家危机意识和未来意识的例证，参见 Keith Jenkins, Sue Morgan and Alun Munslow, eds., *Manifestos for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③ J. 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pp. 60-67.

④ Ignacio Ola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1, 1995, p. 28.

实,但是,元叙事的确是历史学的重要认同或整合力量。人类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有关历史总体进程的宏阔理论框架中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和展望未来。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减人们对宏大叙事的热情。正如克莱因所言:“从列维·施特劳斯到利奥塔、从克利福德到福山,我们一直受到历史的困扰,不时地回到大故事,即便我们急切地想要与主叙事的害处一刀两断。”<sup>①</sup>其实,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攻击本身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在试图说明现代元叙事的虚构性的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堂皇的故事。后现代主义驳斥一切意义的基础,自己却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意义的方法。

当人生出现重大变故时,一个人往往会反思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同样如此。当前,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经济危机和恐怖事件等天灾人祸必然会引发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病痛性反思。另外,世界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为了理解其当下展望其未来,人们需要了解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对全球史和世界史的需求显而易见。自19世纪以来,在经过从政治史学向社会科学史学再向新文化史学的转变之后,西方史学实践似乎正在向全球史学转变。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一种宏阔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元叙事,作为新的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理论前提。这种世界历史理论的确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新的哲学反思,但与圣奥古斯丁、黑格尔、孔德、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过时的思辨历史哲学不同,它将致力于把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严格的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努力构筑一种本体论意义上新的“历史的理性”。<sup>②</sup>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或元叙事,它所讲述的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实故事。在面向未来的元叙事的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最起码也应该成为新叙事的最重要指导或参照。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回归有关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的必要性,但对于历史语言再现实在之类宏大叙事来说,这也同样是真确的。实际上,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出现之日起,西方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捍卫历史客观性的努力就从来没有间断过。<sup>③</sup>海登·怀特曾经提出,应该“理解在被人们想当然地假定是对于世界的实在性再现中的虚构性的东西,以及在所有显然是虚构性的再现中的实在性的东西”。<sup>④</sup>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史学理论家主要从事的是前一部分工作。可以说,“语言学转向”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历史文本这类实在性再现的虚构性。大约从20世纪末尤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史学理论家(包括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主要进行的似乎是怀特所说的后一部分工作。海登·怀特在其后期著述中,主要从文学理论出发探讨历史写作的真实性问题。<sup>⑤</sup>安克斯密特则从语言哲学出发探究历史书写的合理性问题。<sup>⑥</sup>约恩·吕森试图融合

① Kerwin Lee Klein, “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4, 1995, p. 276.

② 这种构建新型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努力也反映在安克斯密特的新近论文“Aftermaths and ‘Foremaths’: History and Humans”中,该文即将发表在或于今年创刊的史学理论辑刊《历史与思想》上。

③ 参见董立河:《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求是学刊》2008年第3期。

④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 88.

⑤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⑥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 R. Ankersmit,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语言学转向”、德国历史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合理因素，论证历史学的科学性。<sup>①</sup>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对于我们重构语言透明性的宏大叙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sup>②</sup>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安克斯密特和鲁尼亚等开始尝试逃离“语言的牢笼”，摆脱语言对过去的限定，提出“历史经验”和“历史在场”概念。<sup>③</sup> 他们试图通过对“经验”和“在场”问题的讨论，结合对历史书写客观性的探讨，走一条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折中路线，或者像安克斯密特那样，试图在传统史学理论的语言天真和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言夸张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sup>④</sup> 其目的就是要重建史学的合理性，构筑一种新型的“史学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力图探索出一种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新范式，从而帮助历史学从叙述主义（再现主义）和实在论的二难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被有些学者（比如伊格尔斯）称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sup>⑤</sup> 或者“后-语言学史学理论”（比如 Peter P. Icke）。<sup>⑥</sup> 后-后现代史学理论并没有完全摈弃后现代史学理论，而是对后者的辩证扬弃。这里的“后-”（post）不仅仅标示时间，而主要表示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或诉求。

从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问题域看，我们似乎要面对一个世纪之前狄尔泰所曾面对过的任务：历史理性批判。而且，当下的局面更为复杂，任务也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在充分借鉴西方传统历史认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历史语言层面上重新讲述历史书写真实性的故事，进行“史学的理性”的新批判。我们还要在严肃对待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总体趋势，在历史本体论层面上重新讲述有关历史发展模式 and 方向的目的论故事，从事“历史的理性”的新批判。当然，在构建新型“历史理性”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也必须加以充分考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语言论思想应当成为我们进行历史理性批判的重要指南或圭臬。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Jörn Rüsen, *History: Narration, Interpretation, Orientatio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② 参见董立河：《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求是学刊》2008年第3期。

③ F. R.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 R. Ankersmit, “‘Presence’ and Myth,”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5, no. 3 (October 2006); Eelco Runia, “Prese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5, no. 1 (February 2006); Eelco Runia, “Spots of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5, no. 3 (October 2006).

④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21.

⑤ George Iggers, “A Search for a Post-Postmodern Theor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8, no. 1 (February 2009).

⑥ Peter P. Icke, “Frank Ankersmit’s Narrative Substance: A Legacy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vol. 14, no. 4 (December 2010).